

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述评

俞明雅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摘要:近年来,在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和教科书建设成为新课改着力点的双重影响下,清末民初教科书日益被学界所重视。通过对最近十余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现有研究以探讨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本体建设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取向,并着重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视角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历史脉络、编制特点、出版发行、编审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已有研究深化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也为社会转型期的教科书建设提供了参照资源,但对清末民初易代之际教科书特点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教科书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政治易代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5-0061-08

近年来,教科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和教科书建设成为新课改着力点的双重影响下,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教科书逐渐被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政治易代、文化冲突、社会变革、教育革新等等都赋予清末民初这一时段以特殊的历史意义,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又赋予清末民初教科书以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清末民初教科书不仅可以呈现新式教科书诞生之初的历史面貌,还可以揭示易代之际教科书的发展特点,与此同时,也能够对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教科书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基于此,本研究拟对最近十余年有关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考察其研究现状,找寻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期当前教科书的建设提供参照资源。

一、研究方法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清末民初”并含“教科书”为检索词进行初步检索,筛除无关文献后,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256 篇(自 200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其中期刊文献 177 篇,硕博论文 40 篇,会议论文 11 篇,报刊文献 28 篇。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分析(见图 1)

由图 1 可知,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的文献量除 2006 年和 2011 年偶有回落外^①,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前五年于 2009 年达到峰值,最近五年于 2014 年达到峰值。分析其原因,2005—2010 年间文献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形成了代表性的教科书研究团队和研究者;2011

^① 2015 年文献量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笔者搜集文献时,部分已发表论文还没有上网。

—2015年间文献量的显著上升与人民教育出版社领衔的“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有密切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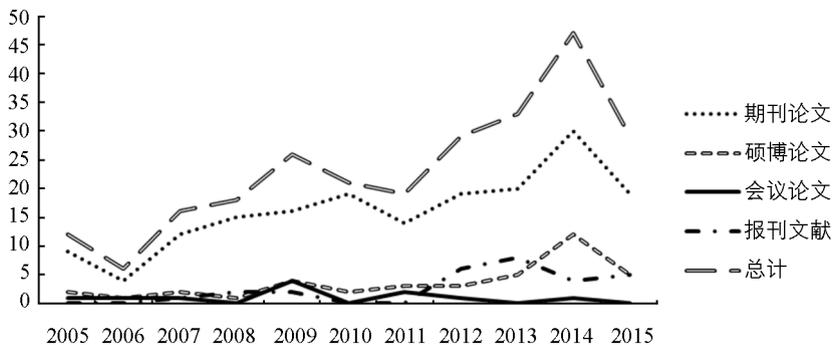


图1 最近十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文献量统计

(二)文献内容分析

鉴于清末民初教科书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为了更好地把握清末民初教科书的脉络,笔者在对文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从研究取向、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1. 研究取向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目前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两大取向。

一是本体取向。即从教科书自身的建设出发,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和编制策略、编审制度等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对历史的回访获得参照现实的资源和启示。这一取向的研究以教育学者尤其是专攻教育史和学科课程的学者为主体。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史以及课程研究中缺乏对教科书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鉴于此,相关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教科书的研究,以期拓展研究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教科书成为课改的着力点,学界在借鉴国外教科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试图向自身的传统寻根,以期从近代教科书的历史发展中汲取智慧,进而为现实提供参照和借鉴。

二是文化取向。即将教科书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宏阔背景下,探讨教科书与社会、文化、政治的深层互动。这类研究主要受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的影响。近年来,“各种各样的专史大都将目光由精英转向民间,注意研究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行为”^[1]。正是在这种史学观的影响下,教科书作为一种史料进入近代史研究的视域,并借由教科书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看,清末民初教科书是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总体而言,这一取向的研究以近代史研究者为主体,主要是将清末民初教科书作为一种史料或分析资料,去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出版史中的相关问题。此外,石鸥领衔的教科书研究团队也大多属于这一研究取向。

2. 研究内容

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相关研究涉及了多个方面的内容,概而言之,主要涉及发展脉络、编审制度、编制特点、出版发行这四个层面的内容。

(1)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脉络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有研究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勾勒。吴小鸥的研究认为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以引进西方教科书为首倡期(1840—1896),学堂、书坊和官方教科书大量涌现的递增期(1897—1911),全新教育宗旨和教育思潮影响的繁盛期(1912—1922)^[2]。曲铁华、于桂霞从教材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民初教育改革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发展阶段,其中白话文教材法定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小学教材由近代

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3]。与此相对,有研究则对具体科目教科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刘景超的研究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经历了从出现到逐步规范再到日趋成熟直到衰落退出的发展过程^[4]。李祖祥的研究认为,清末民初的小学思想品德教科书经历了从灌输封建观念为主的“修身”教科书(1904—1911),到体现资产阶级政治观的“修身”教科书(1911—1923),再到以培养公民素质为主的“公民”与“社会”教科书(1923—1927)的历程^[5]。吴驰则认为清末民初的英语教科书经历了从读写到听说的转向^[6]。孙广平的研究认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英语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引进英美原版教科书到引进日本的英语教科书再到自编英语教科书的历程^[7]。刘斌的研究提出,清末民国时期的体育教科书经历了兵式体操到现代体育的转变,这其中清末民初的体育教科书经历了兵式体操从传入到兴起再到消亡的发展历程^[8]。综上所述,不论是对清末民初教科书整体发展脉络的梳理,还是对具体科目教科书演变历程的分析,整体而言,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引进他国教科书到尝试自编教科书再到稳步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作为新事物的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发展演变的历史图景。

(2)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审制度

整体而言,最近十余年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审制度的研究,已经从概述性分析延伸到对教科书审定制确立的具体过程、审定的操作流程、审定范围等内容的细致梳理。

第一,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过程

近年来的研究提出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京师大学堂、总理学务处和学部三个时期^①。其中,京师大学堂不仅实际负责各地所编教科书的审定工作,还颁行了《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是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初创期。总理学务处时期,清政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学务大臣负责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予以明确,并在各省设立学务处,负责本省教科书的审定工作,是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1905年学部设立后颁布教科书审定凡例,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教科书的审查标准,并开始大规模、系统地审定教科书,由此教科书审定制正式确立。

第二,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标志

近年学界对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标志提出了不同看法。王建军认为《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是近代教科书审定制正式确立的标志^[9]。而张运君提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教科书审定制的确立,一是制度层面,要建立审定机构、确定审定人员、拟定审定标准;二是实践层面,要切实履行审定职责,颁行审定书目^[10]。基于此,张运君认为《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只是确立了审定机构和审定原则,没有制定具体的审定办法和标准,总理学务处审定的教科书也甚少,所以不能以《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作为审定制确立的标志,而应以《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凡例》和《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表》的颁行为标志^[11]。

第三,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原因

张运君认为,新式教科书的重要功用(铸造人才、救国、促进教育)、意识形态控制、规范教育内容、维护教育主权和民族自尊、为教科书国定制做准备是晚清政府审定教科书的重要原因^[12]。王昌善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教科书编审制实则是国家控制的过程,清末教科书审定制的形成是学部等支配集团与坊间书局等被支配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13]。朱文镇、岳爱武则认为,民初政府实行教科书审定制是为了加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为了适应教科书迅速发展的趋向^[14]。

^① 参见张运君. 京师大学堂与近代教科书的审定[J]. 历史档案,2009(1):118—120;张运君,朱鹰. 略论清末总理学务处时期的教科书审定[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0—114;张运君. 晚清学部与近代教科书的审定[J]. 历史档案,2011(1):84—94,103.

第四,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历史地位

近年来,学界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的评价日趋客观中肯。大多数学者摒弃了阶级对立的评价取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这个问题。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承认清末民初教科书审定制在规范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但也充分肯定了教科书审定制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指出清末教科书的审定坚持以学术标准为主,使得通过学部审定的绝大部分教科书质量甚高;另一方面,肯定了教科书审定制在促进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及出版业规范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3)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制特点

不论是对教科书发展脉络的梳理,还是对教科书制度的探讨,最终都以编写出更优质的教科书为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说,教科书研究的落脚点是促进实践层面的教科书的编写。通过文献的梳理可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特点的探讨也是最近十余年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同时,现有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首先,从语文、历史等人文社科类教科书延伸到多学科、多门类的教科书。

其一,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团队。比如,上海师范大学丁炜指导的硕士生群体对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选文标准、编排体系、生字字量、字种、字类、插图等内容做了系统的分析^①。其二,自然科学类教科书逐渐被关注。这其中对地理教科书的研究增幅最大,现有研究涉及了清末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编制理念、编写体系、图像系统、内容结构等内容^②;数学教科书的研究以代钦、魏佳等研究者为主体;化学、生物等教科书开始被关注,谭永平探讨了清末中学博物教科书总的进化论内容^[15]、郭震分析了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内容特点^[16]、吴成军分析了清末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中实验的特点^[17]、赵志军则梳理了清末民国时期高中生物教科书中栏目设置的变迁历程^[18]、尹静对清末初等化学教科书的概念构成和特征进行了研究^[19],等等。其三,女子教科书、乡土教科书等颇具特色的教科书被纳入研究视域,其中刘景超对女子教科书的分析^[4]、李新对乡土教科书的研究^[2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前述可知,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教科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已经从面上观照进入到学科透视的层面,学科类型的逐渐完备也显示出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史料的整理和挖掘有了明显的进展。但也必须承认,对清末民初实用技术类教科书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这也是后续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

其次,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特点的分析由宏观叙述到微观深入。

近年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从对编制特点的笼统梳理,发展到对不同学科教科书编制特点的微观分析。有研究从内容切入,探讨这一时期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有研究从编排设计切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排体系、插图设计、图像系统、字体字类、栏目设置等进行分析;有研究则从编制结构和编制理论切入,探究这一时段教科书的编制思想和编写特点。细究这类研究背后的理路,可以发现其论证逻辑的细微差别。一些是直接从教科书文本入手,通过内容分析法,总结提炼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的特点;另一些则侧重于从教科书编制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其和清末

① 参见顾炜. 清末初等小学堂女子国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梁倩倩. 清末小学作文教科书编排体例与内容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史云侠. 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生字字量、字种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韦薇. 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标准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张正晨. 清末小学国文教科书插图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朱秀秀. 清末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字类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② 参见代玲玲. 清末小学地理教科书及其理念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朱楠. 清末地理教科书发展及中学堂地理教科书系统结构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林培英,饶悦榕. 我国清末中小学地理教科书内容结构研究[J]. 地理教学,2014(8):12-15

民初教科书特点的关系,比如吴海涛、吴勇分析了近代教科书编制过程中的研究行为^[21],喻永庆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为例探讨了教育期刊对教科书的影响^[22],陈一丁分析了课程理论对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影响^[23]。

(4)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出版发行

这类研究实则是将教科书作为出版史的个案,通过研究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变迁来梳理清末民初时期的出版史。具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科书出版情况的整体研究

刘桂芳、洪港从版权立法的角度切入,梳理了清末民初时期在教科书版权制度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24]。洪港、王莉则将教科书出版置于清末民初政治变革的背景下,考察不同政权在教科书中塑造的强势话语以及民营出版业对政治管控的应对措施^[25]。张雪峰从清末教科书出版活动的影响入手,分析了清末教科书出版业在推进近代教育事业和推动民营出版业迅速崛起中的历史作用^[26]。还有研究从行业竞争的角度讨论了近代教科书出版业的发展情况,其中,余望借用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和“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中华书局的崛起和近代民营书局之间的教科书价格大战^[27];吴永贵则以中华书局为个案分析了民营书局出版竞争在促进教科书质量改善、编写创新、价格下降、印装进步、服务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8]。

第二,出版机构的研究

近年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出版机构的研究侧重于民营书局。清末教科书的出版集中于以“资本运作、内容取胜”的商务印书馆、“版权保护先行者”文明书局以及“白话文教科书先驱”彪蒙书室^[29]。民初教科书出版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现有研究主要从历史贡献、现实借鉴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此外,李新研究了国学保存会与乡土教材的编纂出版^[30];丁西省论及了益智书会这一清末民初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31];付雷梳理了晚清中小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以传教士为主的出版机构、清政府官办出版机构以及民间出版机构^[32];刘常华论及了清末学部编译图书局在教科书出版中征收印花税的失败尝试^[33]。由前述可知,现有研究对清末民初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做了很多的分析和研究,相对而言,对清末民初的官方出版机构(包括学部、各省的官方译书局)以及小型民营出版机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第三,重要人物的研究

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制出版中的相关人物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外国传教士,崔华杰、王磊探讨了益智书会的主要人物——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的编写^[34];二是留学生,吴小鸥、石鸥探讨了晚清留日学生和民初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35-36];三是传统士大夫,李斌论及了清末古文家与国文教科书的编写^[37];四是人物群体,林建平研究了浙江教育家在近代教科书出版中的重要作用^[38],吴海涛论及了无锡华氏家族对近代教科书的贡献^[39]。

3. 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确定了分析、解释问题的切入点和立足点。最近十余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清末民初教科书展开分析。

(1)从教科书编制理论的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从技术层面观照教科书的编制特点和编制实践,是教科书研究的传统范式。现有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呈现方式、编排设计的探讨都是基于这一视角而展开的。这类研究的落脚点主要是以史为鉴,即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回访,为当前教科书的建设寻求方法与途径。

(2)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内嵌的权力关系

社会学取向的教科书研究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末,根源于对工艺化课程开发范式的反思,是

课程研究范式从“开发”走向“理解”在教科书研究中的自然延伸,于20世纪90年代引起国内课程研究界的关注。近年来,从社会学视角审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日益增多,比如对清末民初国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分析、对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形成中各种权力博弈的分析,等等。

(3)从历史学的视角勾勒教科书的发展脉络,探究清末民初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清末民初新式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也拓展到文化史、思想史、出版史、社会史等不同领域。这其中,毕苑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探求清末民初教科书与近代文化转型、学术变迁之间的关系^[40],刘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历史教科书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民族历史定位^[41],朱贞从晚清教科书切入,探讨经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地位^[42]等可堪这类研究的代表。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最近十余年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内容由浅入深、由笼统到细化、由宏观叙述到微观深入;研究取向以探讨教科书的本体建设和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研究视角从单一到多元,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日益增多;研究群体逐渐扩大,形成专业研究团队;等等。这些努力不仅深化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也为当前教科书的建设提供了参照资源。但是现有研究对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教科书特点的分析和阐释仍然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一)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自身境遇和心态是否会带入教科书的编制之中?如何体现?

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文本,但不可否认,教科书编者个人的因素或多或少会渗透进教科书文本中^①,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教科书编者个人取向的影响。“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移易,都伴随着众多故国遗民的衍生”^[43],清末民初易代之际也不例外。但是清末民初政治易代的特殊背景,使得处于这一易代之际的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特质都有别于历代遗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对“前朝”的感怀、对“新政”的观望、对自身处境的担忧等等都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话语表达方式。那种特殊的“遗民心态”会不会成为教科书文本书写背后的一股潜流,它又是如何渗透进教科书文本之中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

(二)易代之际的历史延续性是不可避免的,其在教科书中是如何呈现的?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变革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即使发生政治革命、出现政权更替,也无法割裂文化和社会的延续性。这可能导致易代之际的文化定位产生一种“交织的错乱”,也就是说易代之际文化内部会产生交织和错乱,尤其是主导文化和残余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分裂。一方面,政权的更替会导致主导文化的变化,比如民国之初社会主导文化从皇权到共和;另一方面,残余文化仍然继续存在并被体验和践行,比如民初的复古思潮。社会层面的文化错乱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教科书的文化定位呢^②?此外,教科书的“写法”也有其延续性,也就是说,教科书的历史编写经验以及教科书编者的惯习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易代之际的教科书的书写?

(三)易代之际的权力博弈在教科书编制、出版过程中如何体现?

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教科书是近年来教科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这类研究就是试图揭示教科书中内嵌的各种权力关系,比如教科书的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社会控制等等。这也为探

① 吴小鹏曾提出: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社会控制的。具体参见石鸥主编的《教科书评论》P1-14。

② 刘景超曾对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进行研究,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虽然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女性公共空间,打破了“女子无学”的传统格局,但这一全新的本文形式却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即在女子德才观上仍然追求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参见刘景超《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讨易代教科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相比于政治稳定期,易代之际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更为动荡,其间各种势力、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也更为激烈,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教科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权力博弈的影响。比如清末学部教科书一出版即遭各界著论攻之,其中江梦梅从编辑群体的角度批评学部教科书,指责学部教科书“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不知教育为何物,持笔乱改,每有原稿尚佳,一经校勘反不适用者矣”^[44]。事实上,清学部教科书是否真如上述那般不堪,仍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近年,王昌善对清学部校勘者的身份进行了考证,其结果表明江梦梅所说“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的论断有失偏颇^①。既然考据结果表明,清学部的教科书校勘者并不如江梦梅所说那般不堪,那么,江氏如此批评学部教科书的背后可能有着更深的意蕴,即试图通过攻击学部教科书,瓦解其在国人心中的权威性,进而否定教科书“国定制”的合理性。换言之,清末民初对学部教科书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民营书局与官方之间的权力博弈。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转型期,清末民初的新式教科书作为近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不仅深刻地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塑造,其发展演变本身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所以,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特点的分析不仅是研究易代教科书的重要样本,也是探讨易代政治、遗民心态的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 [1] 桑兵.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7.
- [2] 吴小鸥.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启蒙诉求[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37-89.
- [3] 曲铁华,于桂霞. 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J]. 教育研究,2006(4):65-70.
- [4] 刘景超.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之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40-64.
- [5] 李祖祥. 控制与教化:小学思品教科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47-69.
- [6] 吴驰. 由“文”到“语”: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2-170.
- [7] 孙广平. 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D]. 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232-394.
- [8] 刘斌. 从体操到体育——清末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36-182.
- [9] 王建军. 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58-190.
- [10] 张运君,朱鹰. 略论清末总理学务处时期的教科书审定[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0-114.
- [11] 张运君. 晚清学部与近代教科书的审定[J]. 历史档案,2011(1):84-94,103.
- [12] 张运君. 晚清教科书审定原因探析[J]. 出版科学,2009(5):14-20,13.
- [13] 王昌善.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15-103.
- [14] 朱文镇,岳爱武. 民初教科书审定制度考察[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6):26-31.
- [15] 谭永平. 清末中学博物教科书中进化论内容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J]. 课程·教材·教法,2012(2):76-80.
- [16] 郭震. 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内容特点分析[J]. 课程·教材·教法,2014(2):99-105.
- [17] 吴成军. 清末、民国时期的生物学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的实验特点分析及启示[J]. 课程·教材·教法,2014(9):108-113.
- [18] 赵志军. 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高中生物教科书栏目设置的变迁研究[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17.
- [19] 尹静. 清末中国初等化学教科书概念构成及特征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28-88.
- [20] 李新. 固守与革新:百年中国乡土教材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1-237.
- [21] 吴海涛,吴勇.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制过程中的研究行为——以商务印书馆为例[J]. 课程·教材·教法,2008(1):79-84.
- [22] 喻永庆. 近代教育期刊与教科书的发展——以《教育杂志》为例[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2):34-37.
- [23] 陈一丁. 课程理论与清末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纂[D]. 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6-44.
- [24] 刘桂芳,洪港. 晚清及民国时期教科书版权立法述论[J]. 图书情报工作,2009(23):137-140.
- [25] 洪港,王莉. 教科书出版与近代政治变革[J]. 出版发行研究,2008(4):66-70.
- [26] 张雪峰. 试论晚清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及其影响[J]. 图书与情报,2005(2):71-73,78.

^① 王昌善在其论文《晚清政府学部编译图书局教科书编译述评》中对学部校勘者的身份进行了考据,据此对江梦梅的说法进行了反驳。具体参见石鸥主编的《教科书评论》P175-189

- [27] 余望. 从博弈论看近代中国民营书局的教科书之争[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85-87.
- [28] 吴永贵. 出版竞争推动近代教科书的进步——以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为例[J]. 出版科学, 2007(2):15-20, 29.
- [29] 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珍本图鉴子课题组. 清末教科书出版三大家[J]. 出版人, 2014(3):66-69.
- [30] 李新. 国学保存会与清末乡土教科书之编撰[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5):105-110.
- [31] 丁西省. 益智书会与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出版[J]. 兰台世界, 2013(16):31.
- [32] 付雷. 晚清中小生物教科书及其出版机构举隅[J]. 科普研究, 2014(6):61-72.
- [33] 刘常华. “寓禁于税”:晚清教科书学部印花税的失败尝试[N]. 中华读书报, 2013-10-9(14).
- [34] 崔华杰, 王磊. 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编写[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3):144-145.
- [35] 吴小鸥, 石鸥. 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5):89-96.
- [36] 吴小鸥, 石鸥. 民初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成型——基于商务印书馆 1922 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2):96-103.
- [37] 李斌. 清末古文家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写[J]. 文学遗产, 2013(5):136-143.
- [38] 林建平. 论浙江教育家在近代教科书出版中的作用[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3):21-26.
- [39] 吴海涛. 无锡华氏:一个近代教科书家族个案[N]. 中华读书报, 2015-04-15(14).
- [40] 毕苑.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J]. 人文杂志, 2007(2):141-149.
- [41] 刘超. 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10-158.
- [42] 朱贞. 晚清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J]. 学术研究, 2014(3):109-116.
- [43] 孔定芳. 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47-55.
- [44] 江梦梅. 论现行教科书制度及前清制度之比较[J]. 中华教育界, 1913(1):14-22.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Textbook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YU Mingya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has been confined to cover common knowledge and ideas.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actors, the research on the textbook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come a new research focus. This article analyses documents about the textbook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rom 2005 to 2015, with the main orientation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textbook.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haracteristics, publishing and editing system of the textbook betwee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provided the references for the textbook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transformation period.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book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textbook;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odern times

责任编辑 唐益明